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選者自題

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=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/ 饒宗頤作；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主
編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新文豐，民 92
冊； 公分

ISBN 957-17-1988-9（全套：精裝）

1. 學術思想—中國—叢書

112.08

92016820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第八冊 六卷

史學（上）

全二十冊

作 者	饒宗頤
主 編	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執行編輯	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
責任校對	郭偉川
美術設計	雷雨
	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發行人	高本釗
發行及	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所	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
	TEL: (02) 23088624
	(02) 23415293-4
	FAX: (02) 23023870
	(02) 23568076
	網址: www.swfc.com.tw
	E-mail: sales@swfc.com.tw
登記證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
初 版	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
定 價	新臺幣 32,000 元
版權所有	翻印必究（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）

ISBN 957-17-1988-9 08000000（全套：精裝）

08000008（精：第 8 冊）

卷六 史學 目錄

國史上之正統論／一

史學論叢／五六五

南方民族學論叢／八四一

九龍與宋季史料／一二二九

國
史
上
之
正
統
論

目錄

朱序／七

答朱維鐸先生二事／一四

小引／一六

附論神統、帝統與道統／一七

通論

統紀之學／二〇 漢人之正統說／二三 五德終始說新探／二九 鄒、劉五

德之異義及正閏說之緣起／三六 晉初及北朝修史斷限之爭論／四三 正

史與霸史之確立／五〇 唐之正統論／五二 宋之正統論／五七 金、元及

明初之正統論／七三 明、清學人「統紀」之著作及正統說／八〇 宋、

元、明以來本正統觀念改撰之史書／九〇 釋氏史書之正統論爭／九八

結語／九九

資料一

晉 習鑿齒／一〇五

北魏 張彝／一〇八

唐 蕭穎士／一〇九 皇甫湜／一二一 陳鴻／一二四

- 宋 王欽若等／一二七 張方平／一二九 歐陽修／一二〇 蘇軾／一三六 章
望之／一四一 畢仲游／一四一 陳師道／一四二 章棻／一四五 司馬光／
一四六 劉恕／一五〇 廖行之／一五二 張栻／一五三 李燾／一五五 朱
熹／一五五 葉適／一五七 黃裳／一五八 周密／一五九 鄭思肖／一六二
金／一六六
- 元 楊奐／一六七 姚燧／一七〇 謝（修）端／一七三 燕山修端／一七六
陶宗儀／一八〇 貝瓊／一八五 馬端臨／一九〇 張紳／一九〇 陳樞／一
九三 吳澄／一九四 吳萊／一九六
- 明 王禕／一九八 胡翰／二〇一 方孝孺／二〇三 徐一夔／二二一 朱權／
二二三 王行／二二三 徐奮鵬／二二五 楊慎／二二六 丘濬／二二九 費
閻／二二三 章潢／二三四 謝陞／二三〇 豐坊／二三七 吳繼京／二四〇
張自勛／二四〇 嚴衍／二五五
- 清 魏禧／二六五 王夫之／二七〇 宋實穎／二七二 邵廷采／二七五 甘京
／二八〇 蔣汾功／二八二 葉燮／二八三 錢維城／二八七 徐世佐／二八
九 計東／二九二 刁包／二九三 張宗泰／三〇二 葉維庚／三〇二 段長
基／三〇五 趙翼／三〇六 魯一同／三〇八 儲同人／三〇九 周樹槐／三
一九 梁廷枏／三三一 梁玉繩／三三二 龔自珍／三三三 方宗誠／三三四
李慈銘／三三三

現代 梁啟超／三三四 章炳麟／三四〇 蒙文通／三四三 柳詒徵／三四四
資料二

秦／三四八

漢 劉歆／三五一 王愷弘／三五三

魏 蘇林、董巴／三五七

南齊／三五八

北魏 高閭、李彪等／三五九

唐 封演／三六五

宋／三六六

金／三八〇

元 王惲／三八八

明／三八八

附錄 饒宗頤／三九二

資料三

唐 劉知幾／三九九

宋 張栻／四〇一 韓元吉／四〇四 周必大／四〇五 蕭常／四〇七 歐陽守

道／四〇八 高似孫／四〇九 尹起莘／四一二 俞文豹／四一四 黃震／四

一六 林景熙／四一九

金 趙秉文／四二〇

元 趙居信／四二三 黃君復／四二四 胡一桂／四二五 張之翰／四二六 陳

櫟／四二七 趙世延／四二九 王義山／四三〇 郝經／四三一 馮良佐／四

三四 苟宗道／四三五

明 秦鳴夏／四三七 王洙／四三八 柯維騏／四四二 黃佐／四四八 康大和

／四五二 王惟儉／四五二 葉向高／四五五 王圖／四五七 陳邦瞻／四五

九 于若瀛／四六一 鄒觀光／四六二 謝陞／四六五

清 魏裔介／四六七 孫寶仁／四六九 趙作羹／四七〇 黃中堅／四七七 俞

樾／四八〇 胡玉綰／四八一 謝啟昆／四八四 潘飛聲／四八八 姚瑩／四

八九 陳鱣／四九一 費密／四九三 熊錫履／五〇四 釋契嵩／五〇六 僧

志磐／五〇七

後記／五〇九

附錄 宋代有關正統論之史籍摭佚 阮廷焯／五一〇

《正統論》序

朱維錚

饒宗頤先生的《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》，自一九七七年在香港問世，即廣受海內外學者矚目。本書的副題，標示探討的中心，在於中國傳統史學的一種觀念，——其實是困擾中國歷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學者達兩千年的一個核心觀念。

中國史學，素稱發達。十九世紀黑格爾在他的「歷史哲學」演講中曾說：「中國『歷史作家』的層出不窮、繼續不斷，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。」雖說如此，時過近百年，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，晚年的梁啟超在「廣中國歷史研究法」的系列講演中，仍然慨嘆中國史書這麼多，卻沒有史學的專史，「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」。

於是在本世紀中葉，陸續出現了金毓黻、魏應麒、李宗侗等幾種《中國史學史》。諸書自有特色，共同問題不在簡略，而在整體架構都沒有超脫梁啟超設計的「史學史的做法」，內容不外四部分：史官，史家，史學的成立及發展，最近史學的趨勢。

何謂「史學」？梁啟超給出的定義，仍是「以史明道」。他把劉知幾、鄭樵、章學誠三人的理論，說成中國「史學」進化的程度表徵，尤其稱道章學誠「集史學之大成」。這三人的確屬於中世紀中國罕見的史學理論家，但他們的「史學」，有沒有突破傳統的歷史編纂學的範疇，仍有疑問。以章學誠而論，此人在朱熹理學仍被清帝國統治者奉為實踐圭臬，而漢學家已通過考證將統治學說的經典

依據破壞無遺的十八世紀晚期，同時抨擊漢宋兩種學風，否定唐宋以來史部著作屬於「史學」，重申「六經皆史」說，強調「史學所以經世」，儘管無一屬於新鮮發明，卻終究提出了「史學」是什麼的問題。但他「集大成」的意義，也僅止於此。在同時代的漢學家那裡，「六經」早已成為史料，而章學誠仍堅持史學應為經學的附庸。在戴震、汪中看來，朱熹的理學，也已變作「以理殺人」的工具，而孔墨顯學的歷史是非，也需要重予評論，但章學誠卻以為戴、汪等居心叵測，一概斥之為「誹聖謗賢」。甚至最佩服章學誠的胡適，也不能否認，此人的「衛道」成見頗深。倘若仍以章學誠的「史識」，當作中國「史學」的判別尺度，則編成的中國史學史，無論在細節上如何精詳，也很難說跳出了傳統的歷史編纂學的窠臼。

這個窠臼，賴以範圍史家的一道無形屏障，正是愈來愈糾葛不清的「正統論」。

還是梁啟超，早在一九〇二年發表過《新史學》，於呼喊「史界革命」的同時，把正統論當作中國舊史學最荒謬的觀念予以攻擊。他說，提出所謂正統者，已表明其人將國家視為君主私產，要借天命論以證明他們「生而有特別之權利」，「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，視同無物」。他譏嘲由朱熹到乾隆的正統說，不但所立標準互相矛盾，即使依其標準，在秦以後也沒有一個王朝可稱正統，「成即為王，敗則為寇，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為月旦法門者」。「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，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。」

似乎用不著特別指出此說的歷史影響。那以後的中國史學史論著，說到歷代抨擊的同時，又特別讚揚劉知幾、鄭樵、章學誠的史識，也恰又重蹈梁啟超晚年的覆轍，忘記了這三人都是正統論的堅決捍衛者。

這裡的同病就在於缺乏歷史觀念史的深入研究。任何觀念，即使在後人看來純屬荒誕的觀念，在歷史上能占一席之地，無不有其理由。何況如正統觀念，不僅長期支配過中國人的頭腦，還經常影響著各色人等的政治行為乃至重大決策，那就更需要首先辨明它的不同歷史型態，才可能進而探究不同型態所映射的現實的社會關係。因而在它絕不能由義憤所消除，也絕不會被嘲罵所擊破。對於這類歷史性的觀念，倘若滿足於了解「是什麼」，自然是不夠的；但倘若還沒有問明「是什麼」，便急於解釋「為什麼」，則無論解釋得如何頭頭是道，也總不免令人懷疑那個所謂「道」，不過是心造的幻影。饒宗頤先生的這部《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》，所以引人矚目，正因為是深入研究歷史觀念史的一部力作。

本書「小引」可證，著者從事新編，從創意到成稿，歷時凡五年，單為網羅文獻，索閱佚書，便曾足履三洲，至於「淹貫乙部，旁通別集，為獨立之探究」，其用力之勤，更可想而知。

為了說明正統觀念的發展、衍化和爭論的歷史實相，著者縱觀三千年，橫比諸王朝。通論十三篇，考訂或探討的課題，由各章細目所提示，累計便有一百三十五道。集合這百餘道難題，每道都盡量引證材料，說明問題的由來，異論的出現，在何時何地由什麼人什麼書提出或改變的，力求無一語無來歷，同時又給出著者本人的歷史判斷，信以傳信，疑以存疑。而著者似乎惜墨如金，涉及的時人跨度如此悠久廣闊，所論的人與事各以數百計，但通論的全稿，總共只有六萬字。由博反約，本書堪稱佳例。

本書的編纂形式也獨具一格。通論之後，詳列參考資料，凡三篇，都是照錄原文，注明出處，依次排列，間附著者按語或同代學者意見，並限於材料本身的考辨。著者沒有明示三篇資料的分類原

則。由選文來看，「資料一」，當為四世紀後歷代學者直接論正統的著作，凡收八朝及民國八十二位學者的論說一〇六篇，附按語十八則，近說九則；「資料二」，是秦以後德運說和議禮文的輯錄，凡收十朝十二種著作內的文字十六節，附近說三則，及著者論文一篇；「資料三」，為有關史論，凡收自唐至清十朝四十八位史家的文章各一篇，附按語二十九則，近說四則。三類總計錄文一七〇篇（節），按語四十七則，近說十六則，又附文一篇，凡提及姓名的學者史家，超過一五〇人，全部字數超過二十萬，是通論字數的三點三倍。

因此，本書既是史學專著，又是史料匯編。但二者的有機結合如此緊密，以致倘作分割，則通論既失卻支柱，資料也失卻綱領。不過，就三類資料本身而言，著者輯集的目的，顯然不僅著眼於支持通論的歷史陳述，更多地是為了提供歷代正統論及其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的歷史證明，用著者的話說，「以供同好進一步之論定」。這就使本書的結構，形成了主觀與客觀的奇特統一。通論和按語，重在表述著者本人的考辨或探討的成果，而資料和附說，則重在提供有關正統論的系統史料。著者對資料及附說的見解，以及這些見解與歷史實際的契合程度和時代影響，是同意還是反對，是肯定還是否定，是以為重要還是不那麼重要，都不是抉擇的尺度。如此將個人見解和相關材料，既無使混淆，又有機結合，至少在國內史學界屬於罕見之例。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承乏先師陳守實教授的中國史學史講席，迄今已逾三十年。就寡聞所及，國內近數十年專究歷史觀念史的論著本就稀見，而以正統論為題進行全面系統考察的專著更未發現。我所見而又是同行公認的力作者，唯饒先生這一部。

饒宗頤先生在史學上論著十分豐富，曾自定《選堂集林·史林》三巨帙，於一九八二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刊行；又有《饒宗頤史學論著選》，由季羨林教授作序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九九三年出

版。季先生的《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》，對饒先生的生平、著作和學術成就，已有周詳的評價，特別對饒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治史成績有中肯的概括。因而，這部《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》，是饒先生在史學方面的代表作，但要全面了解饒先生的史學見解，單憑本書是不可能的。

不過就書論書，本書也如任何名滿學林的鴻篇巨製一樣，難免引起爭論。我不同意一種說法，以為饒先生的這部書，是為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辯護的。的確，饒先生自己並不諱言，他是，「贊成正統的」，但這話也不意味著他贊成歷史上那些正統論。本書通論的結語，已有明言：「正之義尤重於統」，「歷史之秤是謂之正」。而歷代正統論者，除極少數例外，出發點和歸宿恰好相反，所爭乃現在之「統」，而非歷史之「正」。前引梁啟超在清末《論正統》，便首先抨擊他們所謂統的定義荒謬，指出「統之義已謬，而正與不正，更何足云」，因而列舉他們衡量正不正的六條標準，逐點予以駁斥。章太炎晚年在《國學略說》中論及正統之說，也批評歷代論者的正閏之辨，雖不像梁啟超當年那樣一概否定，但也以為「書法固當規定，正統殊不可問，所謂不過假年號以記事耳」。在這一點上，饒先生與梁、章的見解並無二致。我曾說饒先生著本書，意在「證前史論正統之非」，便是比較而言。

不待說，饒先生的這部書，也可以略有匡正。例如通論篇十述及明初方孝孺《釋統》及《後正統論》之貢獻，指出其師胡翰有《正紀》一篇可與方文相參，再以夾注指出：「翰之學後來影響及黃宗羲，《明夷待訪錄》引其十運（原書作『十二運』——筆者注），即集中之《衡運》。」資料一的元代部分，全錄胡翰《正紀》。但由方孝孺《後正統論》、黃宗羲《明夷待訪錄》來看，胡翰的《衡運論》對他們的歷史觀更有影響。《宋元學案》卷八十二「北山四先生學案」全祖望據《仲子文集》補

入胡翰文六篇，首列《衡運論》，次列《正紀論》，無疑是因為《明夷待訪錄》劈頭便推崇《衡運論》的緣故。胡翰在《衡運論》文末強調他的「十二運」說，「聞之廣陵秦曉山」。《明夷待訪錄》也據此強調「十二運」說是秦曉山的發明。秦曉山的身份不詳，據胡翰文推測，或為元末明初居揚州以《易》算命的卜人。倘若這推測不錯，則表示宋以後在南國民間流傳的運命論，至遲在十四世紀已影響到士大夫階層，因而「正統論」不僅受傳統學說的影響。章太炎在清末曾譏黃宗羲著《明夷待訪錄》，「將俟虜之下問」，未必是定論，但秦曉山、胡翰的十二運說對黃氏晚年的政見史觀影響甚大，則是事實。《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》在資料三篇中，既沒有收《衡運論》，也沒有收《明夷待訪錄》的相並議論，致與通論已點出的要旨不相應，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。

我對本書通論結語特別強調「歷史之秤是謂之正」，甚感興趣，很想知道饒先生的權衡標準。但通讀全書，發現秤星仍在「道德批評」。這頗使我迷惑。我不贊成道德相對主義，然而歷史上的正統論，涉及的主要是政治道德，而古往今來，人民常視作不道德的行為，在政治生活中卻常被視作是必要的，因而是道德的，例如神道設教、權術是尚、愚民為政等等。這無疑都屬於饒先生所否定的「一時相對之是非」，但卻是長期困擾歷代史家的政治道德通則。本此通則進行道德批判，必定陷入康有為早年的權力崇拜論，認定權力是衡量道德的尺度。而反此通則，又將陷入章太炎早年的革命道德說，以為道德可以支配一切，結果仍以損人利己的程度作為衡量道德高下的尺度，還是與梁啟超的道德相對主義殊途同歸。因此，我很佩服饒先生在本書結語中的見解，「即本天下觀念以看歷史，視歷

史為一整體」，「以世界眼光看歷史，從過去人事覓得共事規律以為行動之借鑑」。這無疑是中外古今哲人共同的高尚理想，然而往昔的歷史和歷史的觀念如正統論，卻是不聽從任何道德的教訓，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中走自己的路，怎樣的批判準則才能成為歷史之秤的秤星呢？甚願饒先生有以教我。

一九九六年乙丙之際